

1988

中国
金融年鉴

Almanac
of China's
Finance and Banking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北京

1988

中国金融年鉴

Almanac of China's Finance and Banking

中国金融学会 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北京

1 9 8 8

中国金融年鉴

中国金融学会 编

出版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北京西交民巷17号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陕西激光照排所排字

787×1092 16开 印张38.5 插页3印张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7-5049-0367-1/F·63
国内定价：17.00元

《中国金融年鉴》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陈慕华 乔培新

主 编 刘鸿儒

副主编 赵海宽 张 屯 许树信

委 员 (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王克华	王绍飞	冯大麟	司 理	刘光第	刘廷焕
刘鸿儒	许树信	陈伟力	严 毅	闵一民	吴念鲁
吴瑞章	周 骏	周汉荣	罗元铮	张 屯	张守仁
杨培新	林继肯	洪允成	俞天一	赵 洪	赵效民
赵海宽	袁纪录	黄 达	盛慕杰	程万铸	景宗贺
路建祥	雷祖华	窦建中	潘履孚	戴相龙	

《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主 任 赵海宽

第一副主任 许树信

副 主 任 李 珏 秦池江 胡学慧

编 辑 (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丁非皆	卫庆华	王松涛	王振洲	王美英	王章丽
王维鑫	伊 明	刘志强	刘纯良	汤志德	孙树茜
曲培萱	许一凡	陈文林	陈霞玲	周战地	张化桥
张天羽	金先圣	梁宝忠	郭世坤	傅继坤	赖金昌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



(代 序 言)

陈 慕 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间，随着我国开放、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金融体制逐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回顾已经走过的路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绩。

第一，制定了金融改革的总体设想方案，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步骤和方法。改革的目标，一是为进行宏观控制建立有力的、灵活自如的、分层次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促进社会资金的有效筹集和运用，坚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货币的基本稳定，以推动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二是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的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聚集和融通资金的信用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筹集资金的积极性，推动资金的横向流动，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资金市场。三是建立以中央银行领导，各类专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强化中央银行职能，逐步实行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经营，做到既能贯彻落实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各金融机构又能自主地筹集和运用资金，具有经营上的动力、活力和外部压力。四是建立金融

机构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并培养一批高级金融管理人才，采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管理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良的金融服务。

第二，建立了以中央银行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改革之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格局，不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国金融体制从1979年开始着手改革。当年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1980年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立出来，1984年又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1985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信贷收支计划全部纳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在过去的几年里，还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重新组建了交通银行；中央和地方设置了近600家信托投资公司；在试办的基础上，发展了1000多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恢复了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经过这样的发展和改革，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第三，金融体系经过改革，进一步扩大了业务领域，在诸多方面收到明显的社会效益。从1980年开始，银行发放了技术改造贷款和基本建设贷款。“六五”期间对工商企业累计发放技术改造贷款435亿元，共支持

了9.5万多个项目，其中全部和部分建成投产项目占87%，已投产的项目新增产值1300多亿元，创造税利287亿元。截至1987年底，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余额已达1115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2.7%。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放基本建设贷款，有一半用于支持能源交通发展。到1986年底，建设银行对电力工业发放的基本建设贷款达80多亿元，支持大中型项目100多个，增加发电装机容量达1100多万千瓦，现在已有几十个大项目和单项工程建成投产，对缓和电力紧张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工商银行在“六五”期间向铁路、民航、交通部门发放贷款58亿元，用于更新汽车8万辆、购船1.7万艘、机车客车1200余台、飞机18架，缓和了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中国银行从1973年就开始发放外汇贷款，截至1987年6月末，外汇贷款已累计使用276亿美元，还有106亿美元正在使用中。这些外汇贷款仅在“六五”期间就支持了1.4万个企业的发展，扩大了出口创汇能力。

通过改革，银行贷款已扩大到科技领域、教育领域以及其他非生产部门。到1987年底，银行对个体工商户贷款总额达15亿元，支持了多种经济的发展。

第四，恢复和增加了一些新的信用工具，适应了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这些信用工具包括零存整取、定活两便、建房储蓄、单位定期存款、信托存款、外币存款，以及发行金融债券、代财政和企业发行重点建设债券，开办邮政储蓄等。在贷款方面，办理了信托贷款、租赁业务、咨询业务、买方信贷、卖方信贷、外汇贷款、外汇配套人民币贷款、商品房贷款、对外承包业务贷款、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抵押贷款；进行了外汇调剂，增加了支票结算、信用证结算和票据承兑贴现、再贴现业务，改进了结算方式。这些信用工具在银行开拓业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根据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实行了新的货币政策。即在坚持信贷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一方面控制不合理的货币投放，一方面适当增加合理的货币信托投放，支持经济发展和增加商品供应，使多投放到市场上的货币能及时回笼，保持市场货币流通基本稳定。1984年信贷规模过大，货币投放偏多，1985年人民银行便采取了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和调整信贷规模的措施，将固定资产贷款严格控制在计划之内；对消费基金采取“先死后活”的办法，先按限额管理，然后根据实际需要陆续解决。在1985年工业产值增长18%、农业产值增长13%的状况下，货币投放196亿元，比上年减少66亿元；各项贷款增加1056亿元，仅比1984年多增加63亿元。这说明控制和搞活都比较适度。1986年初，银行流动资金一度紧张，人民银行采取了“稳中求松”的方针，在按计划控制固定资产贷款规模的前提下，对市场有销路的产品、出口创汇产品、农副产品的收购和生产，都在贷款上给予支持。对自有流动资金不足的新开工投产企业，以及经济效益好的收尾项目，则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筹集资金，办理利率较高的特种贷款，实行资金价格的高来高去，满足了他们对于资金的合理需要。1987年，人民银行又根据上年底贷款投放偏多的情况，实行了“紧中有活”的方针，从信贷和货币两方面加强宏观管理。运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开办信用社特种存款、发行重点建设债券、提高联行贷款利率、加强中央银行贷款管理手段，把信贷投放和货币发行基本控制在国家计划确定的指标以内。

第六，改革了利息制度，发挥了利率的杠杆作用。1979年以来，银行先后七次调整了存款和贷款利率，增加了不同利率的存款种类，对单位开办了定期存款，扩大了存款的计息范围；在贷款方面按照不同贷款期限实行了差别利率，并实行了加收利息、优惠利率和浮动利率制度，使利率的经济杠杆

作用大大增强。

第七，加强了外汇和外债的管理。近年来，人民银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等法规，对外商在我国投资的企业的外汇管理，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鼓励这些企业多出口、多创汇，谋求外汇自身平衡，并允许保留其外汇资金，自行安排使用，利润资本可以自由汇出。

在借用外债方面坚持以下原则：一是总规模要有控制，结构要合理，要与我国的偿还能力和消化能力相适应；二是要用在生产建设上，重点是出口创汇企业、进口替代企业和技术先进的企业；三是利用外资要讲求经济效益，创造的纯收入要留足及时还本付息部分。为此而制订、颁布的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目的就是掌握外债情况，提出指导性意见，使我国的外债在期限、币种、利率、使用情况等方面更趋合理。

第八，保险业务得到恢复和发展。发展保险事业有利于保障国家财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筹集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从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至1987年底，保费收入达217亿元，累计上缴税利42亿元，积累各种保险基金20亿元。现在全国大约有近60万个企业投保企业财产险，承保的财产价值已达15000多亿元。近6000万户家庭投保了家庭财产险，3000多万人参加了人身保险。全国2/3的机动车辆也参加了保险。8年支付各种保险金87.5亿元，及时帮助受灾地区、企业恢复了生产、安排了人民生活，补偿了经济损失。

第九，把建设银行的拨款改为贷款，大大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长期以来，我国的基本建设资金一直采用财政拨款、无偿使用的办法。这种管理办法远不能适应改革形势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银行从1980年开始，在10多个行业试行拨款改贷款。经过五年的试点，1985年国务院决定，将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全部改为由建设银行

贷款。经过实践，从1986年起进一步实行拨款和贷款并存的制度，对一些非盈利性的建设项目实行拨款，对盈利项目实行贷款。到1986年底，“拨改贷”的贷款余额已达570亿元，支持了9000多个项目。尽管“拨改贷”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问题，但总的看来是成功的。

第十，改革了信贷资金管理制度。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实行了“实贷实存”的信贷资金管理辦法。这个办法的特点：一是把计划与资金分开，有了计划还要专业银行自己组织资金，组织不到资金就实现不了计划；多吸收存款就可以多发流动资金贷款。这就有利于调动专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积极性。二是专业银行必须在中央银行分别开立存款和贷款两个帐户，没有存款不能透支，这样有利于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控制。三是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通过短期周转贷款，通过交存款准备金制度，通过联行之间的利率，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四是各专业银行之间可以相互拆借。通过这些管理办法，改变中央银行和各个专业银行之间的信贷资金分配为借贷关系，打破了在信贷资金供应上各家银行吃一个“大锅饭”的状况。

第十一，发展了资金的横向融通，初步形成了资金拆借市场。近两年来，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资金拆借发展较快，有形或无形的资金市场已经在一些大中城市形成。通过市场调剂资金余缺，改变了过去没有钱向上“等、靠、要”的状况。随着各种债券的发行，股票的试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办了一些长期资金市场试点。还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时，开办了一些外汇调剂中心，帮助外资企业平衡外汇收支。

第十二，加强了银行的法制建设。国务院于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还制定了《借款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管理条例》、《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等。中国人民银行还专门设立了条法司，正为进一步加强金融立法作准备。

第十三，对农村信用社管理进行了改革试点。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管理农村信贷资金的金融机构。目前农村信用社绝大部分由农业银行管理。改革的重点则是农业银行要改善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还要根据不同情况搞一些其他管理方式的试点，逐步摸索出适合各地不同情况的管理办法，发挥信用社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第十四，改革加强了银行的内部管理。这几年，中央银行逐步加强和完善了宏观调控手段，专业银行在实行企业化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各个银行之间的联行分办，独立自主地经营。在人事上实行“条条”管理为主、“块块”管理为辅，加强了职工队伍建设，发展了金融教育，加快了银行系统电脑化的步伐。

第十五，经过改革，银行对外金融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80年恢复了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权，1985年5月，人民银行正式加入非洲银行集团（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基金），1986年3月，人民银行正式成为亚洲银行成员。到1987年底，已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192个常驻机构。在经济特区，有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20家银行设立了分行，建立了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和一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上海原有的4家外资银行扩大了业务范围。中国银行作为我国的外汇专业银行，与世界上152个国家和地区的1235家银行建立了业务代理关系。中国银行在香港、澳门、新加坡、伦敦、卢森堡、纽约、悉尼、巴黎、东京、曼彻斯特等地设立了分行，在法兰克福设立了代表处。中国银行和中国银行集团的海外机构共有310多个。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也有40多个。

通过以上改革，银行已成为为我国经济建设筹集和分配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1986年同1979年相比，银行新增加存款，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3%上升到14.7%，通过财政分配的资金由76.6%下降到31.6%，由银行信用渠道分配的由23.4%上升到68.4%，这说明我国经济管理正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由行政管理为主向经济管理为主过渡。

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来说，还有相当距离。

赵紫阳同志在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速金融体制改革，既是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条件”，要求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在这方面迈出新的步伐”。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的报告中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银行在宏观经济调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七届一次人大会议上，李鹏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的调控体系。发挥它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从这几年的实践看，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在不断地克服困难、解决难点中前进的。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积极开拓，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就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银行要抓经济、要办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指示去办。过去，金融体制改革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还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通过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根据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特点，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金融之路。

编辑说明

一、《中国金融年鉴》是金融专业具有历史性、资料性的年刊，主要通过各种经济、金融资料全面地系统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发展的概貌，介绍金融工作的成就、经验、问题和发展趋势。

《中国金融年鉴》创刊于1986年，每年出版一期。1988年刊为总第三期，内容主要反映1987年的情况。

二、《中国金融年鉴》1988年刊的内容分为11个部分。第一部分，重要经济、金融文献。第二部分，经济、金融统计资料。第三部分，一九八七年金融事业的新发展。第四部分，金融体制改革。第五部分，对外金融往来。第六部分，各地金融概况。第七部分，调查报告与专题材料。第八部分，一九八七年金融科学研究。第九部分，一九八七年重要金融法规选编。第十部分，一九八七年中国金融大事记。第十一部分，附录。

三、《中国金融年鉴》1988年刊的各个部分，在与1987年刊保持其连续性的基础上，又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1、在“重要经济、金融文献”部分中，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就国家重大金融政策问题对新闻界发表谈话的内容。

2、在“经济、金融统计资料”部分中，进一步充实了与金融工作有关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刊登了1978—1987年全国信贷资金来源与运用的统计，其中1978年的数字为第一次分布；刊载了各种债券发行统计等。

3、在“金融事业新发展”部分中，除介绍各家银行、公司、信用社一年来业务新情况外，还介绍了新建的各种综合性银行；股

份制银行、大的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多种新型金融机构的情况，充分体现了1987年金融事业发展的盛况。此外，还介绍了厦门和珠海两特区的中外合资和外资金融机构情况。

4、在“金融体制改革”与“调查报告和专题材料”两个部分，在继续反映各地区、各银行（公司）改革的新情况、新做法、新业务的同时，着重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改革中的典型事例、经验做法、以及产生的效果和存在问题，以供读者参考借鉴。

5、“附录”部分中，除刊载1987年底的各家银行、公司负责人名录、外资和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名录外，还发表了全国通存通兑储蓄网点名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式出版的金融图书目录等，以备读者查考。金融书目、宣布废止的法规目录，原计划登在1987年刊上，但由于出版等原因未能刊出，这次的金融书目在原稿基础上又增补了1987年的内容，载入本期附录之中。

四、本期各部分稿件中所列或引用的统计数字，由于口径不一致，包含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以致有时同一名称项目的数字互不一致，或与以前的年鉴刊列数字有所出入。因此，在应用这些数字时，需注意统计口径和适用范围。

五、本期年刊的页码，根据读者意见，改分部编页为全书统一编页，页码标记不再使用罗马数字，改为汉字与阿拉伯数字结合的标记。

六、本刊为中国金融学会编纂，参加编写的同志除各稿件作者外，还有各家银行、公司的总、分行（公司）以及各专业金融学会和地方金融学会的许多同志，他们为本期

年鉴的成书和提高编写质量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和推动工作，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七、由于编辑部人手不足，缺乏经验，

本期年鉴可能仍然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

荣毅仁
87.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兼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题词

求实地反映我国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金融法制以及与
此有同的情况和问题，为我
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素材，
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级的金融事业做出贡献！
一九八二年夏

中国金融年鑑題

千家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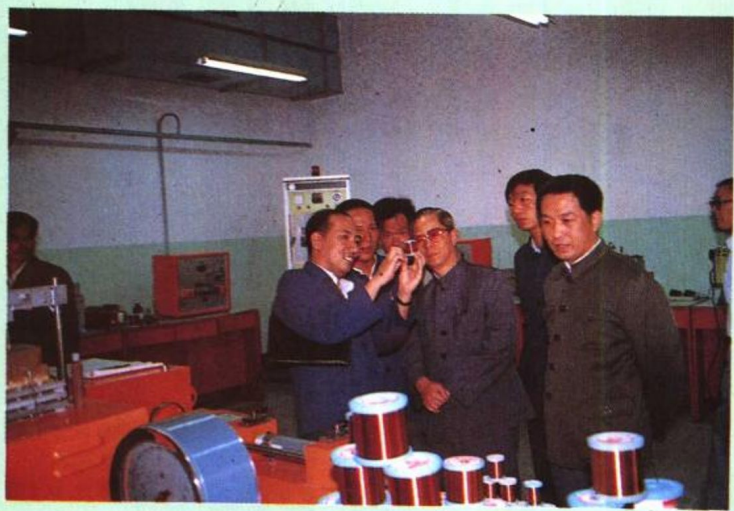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银行1987年公布发行的壹套 新版人民币票式(正面)





国家领导人李鹏、姚依林、田纪云、陈慕华、姬鹏飞等进入会场接见会议代表。

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外机构总经理会议于1987年11月23—30日在北京召开。



福州电线厂检测实验室使用中国投资银行贷款，从国外引进全部测试仪器，成为最先进的实验室。图为方毅同志在视察该实验室。



1987年1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南海紫光阁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藤冈真佐夫先生。



中国代表团在非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三届年会上（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九日）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市阎良区办事处支持西飞公司生产民用飞机，1987年生产“运七”飞机14架。右上图为改型后的“运七—100”外观。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市阎良区办事处支持西飞公司生产民用飞机。图为该公司的“运七”飞机装配车间之一。

中信实业银行以买方信贷支持广州标志汽车有限公司。图为该公司车间一角。





中国农业银行举行新春招待会，扩大与国内外金融、企业界的协作与交流，图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马永伟(左一)、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王景师(左三)、张文祺(左四)、戴相龙(右一)。



图为中国农业银行与企业主管部门座谈，研究如何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图中右起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马永伟)。